

向一位偉大的劇作家致敬

亞瑟米勒

Salute to a Great Playwright

Arthur Miller

36-31



陳正熙

Cheng-Hsi CHEN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

繼去年馬龍白蘭度在七月一日因病去世之後，美國在二月十日失去了另一位重要的劇場人：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享年八十九歲。

對於所有的劇場工作者，亞瑟米勒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是必讀的當代經典作之一，他在劇中所創造的那位推銷員角色 Willy Loman，不僅非常深刻地描繪出美國在一九三〇年經濟大蕭條年代中的真實面貌，更是許多人重新思索所謂「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重要靈感。

亞瑟米勒的一生除了十七部劇作、電影劇本、短篇故事和散文的創作，包括普立茲獎、東尼獎、紐約劇評協會獎的榮譽肯定之外，他的現實人生中也充滿了讓人津津樂道的軼事，其中最為一般大眾所知曉的，應該是他和美國知名女星瑪麗蓮夢露僅僅維持四年的婚姻，和他在美國國會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中的作證¹。

在亞瑟米勒的劇作中，除了《推銷員之死》外，還有讓他在美國劇場界一炮而紅的《我的孩子們》（*All My Sons*, 1947），借古諷今，

以十七世紀的宗教裁判對美國在五〇年代的麥卡錫主義²提出批判的《熔爐》（*The Crucible*, 1953），以愛情與背叛為題的《橋上的一瞥》（*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55），充滿自傳色彩，卻因一己之私而備受批評的《沉淪之後》（*After the Fall*, 1964），繼續以經濟大蕭條為背景的《代價》（*The Price*, 1967）、《大主教的天花板》（*The Archbishop's Ceiling*, 1976）、《美國時鐘》（*American Clock*, 1980）等，和他在二〇〇四年的最後一部劇作《完成畫作》（*Finishing the Picture*）。

亞瑟米勒生在紐約一個商賈之家，原本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直到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完全改變了他的家庭與生活。從高中畢業之後，他必須在汽車零件廠工作，才籌措了足夠的錢，足以支付他在密西根大學就讀一年的學費，之後繼續依靠寫作劇本參加校內的比賽，和一筆來自劇場公會的新劇本獎金，才能順利完成大學學業。畢業之後，繼續劇本的寫作，但除了《幸運兒》（*The Man Who Has All the Luck*, 1944）外，都沒有辦法得到製作演出的機會，《幸運兒》

的演出也未引起太多注意。

一九四〇年結婚之後，亞瑟米勒以寫作廣播節目腳本維生，但仍不甘心放棄劇本寫作，在《幸運兒》之後，決定再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因此完成了《我的孩子們》。《我》劇不僅得到當時紐約時報首席劇評家 Brooks Atkinson 的大力推崇（「一部誠懇的、充滿劇力的劇作（an honest, forceful drama）」），並且被選為當年十大劇作之一，得到東尼獎和紐約劇評協會的獎項。

兩年之後，Willy Loman 正式走上美國當代劇場的舞台，《推銷員之死》成為百老匯史上第一部同時獲得普立茲獎、東尼獎、紐約劇評協會獎三個獎項的作品，年僅三十四的亞瑟米勒也成為舉世知名的新生代劇作家。

《推》劇的成功，將亞瑟米勒一舉推上事業的高峰，卻也在他日後長達數十年的創作生涯投下巨大的陰影：除了《熔爐》得到比較強烈的肯定，並且最常被製作演出之外，他之後的作品，甚至包括一些在外百老匯的演出，得到的評論大多是貶多於褒，票房的表現也不突出。

無論如何，亞瑟米勒一生戮力創作不懈，並且承繼了來自團體劇

場（The Group Theatre）³的傳統，堅持劇場創作的言之有物，和對社會良知的責任感，是他在作品以外，值得我們參考思索的重點。他和奈及利亞知名作家索因卡（Wole Soyinka）的一段因緣，也可以說明他自許社會良知的真實態度。

亞瑟米勒在一九六五年接下國際筆會主席的職務之後，曾在一九六六年致電即將接管奈及利亞政府的 Yakubu Gowon 將軍，要求釋放被羈押並且即將被處死的知名作家索因卡。Yakubu Gowon 將軍因為亞瑟米勒是知名女星瑪麗蓮夢露的丈夫，而決定釋放索因卡。索因卡因此逃過一劫，並且在一九八六年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從在美國國會「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堅持自我良知的作證開始，亞瑟米勒一生不僅戮力創作，也熱心參與現實的社會活動，並且從不吝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充分體現一個藝術工作者、一個知識分子對自己所處社會負責的積極態度，確實是值得我們借鏡的。

即使他的創作生涯在《推銷員之死》之後並不順遂，但亞瑟米勒仍創作不斷，並且積極參與劇場活動，直到二〇〇四年都還有新作的製作演出。在八〇年代晚期的一次訪談中，雖然他以為自己因為許多無聊的等待，而在劇場中浪費了不

少時間，但當被問到希望人們以什麼身分記住他的問題時，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劇作者」，可見他對劇場創作始終如一的熱情。

在一個仍舊充滿衝突的新世紀之初，亞瑟米勒的離世其實沒有得到太多的注意，相關的訊息也會很快被更多的動亂與八卦所掩蓋，唯一不變的，只有《推銷員之死》和《熔爐》會繼續被製作演出，會繼續感動現在的及未來的劇場觀眾。

或許這是我們對他表達敬意最好的方式。

僅以這樣一篇簡單的介紹文章，對這位當代劇場的大師致敬。■

註釋

1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因為蘇聯勢力範圍在東歐地區的逐漸擴大，美俄對立的情勢逐漸形成，在美國國內也逐漸形成對共產主義的疑慮與恐懼，在這樣的社會政治氣氛中，民主黨眾議員 Martin Dies（1901-1972）在眾議院推動成立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並且擔任第一任主席。「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調查美國國內可能的叛亂組織或意圖，並且在 Martin Dies 的主導下，逐漸變成以調查共產黨相關人士及活動為主。委員會使用的技倆包括對當事人及證人提出一般性的指控，對作證的人士施壓，要求揭發相關人士及活動，和理所當然地認定當事人與可疑機構的關係。許多政府工作人員、文化藝術機關人員、作家、電影界人士等等，都受到委員會的約談及施壓，部分人士並因此而失去工作、親人和家庭，受到無從彌補的迫害。亞瑟米勒不僅在委員會的約談中，拒絕供出相關人士的姓名，甚至還對眾議院的行動加以嚴厲斥責，以他對抗強權的勇氣，得到許多百老匯與好萊塢同業的稱許，也樹立了他不畏體制威權的形象。

2 美國威斯康辛州共和參議員麥卡錫，在1950年的一次公開演說中，指控美國國務院已經被共產分子滲透，因而聲名大噪，1952年在共和黨控制國會多數之後，擔任調查委員會的主席，開始利用他的權力傳播共產主義恐慌症（fear for Communism），和對政治異議分子的指控壓迫。麥卡錫利用公開的聽證會、不具名的秘密證人、各式各樣的指控，不僅讓美國社會陷入白色恐怖的不安，更摧毀了無數政府及文藝界（他的主要目標）工作者的人生與家庭。麥卡錫的做法逐漸引起輿論與參議院同僚的不滿，參議院在1954年對他提出公開的譴責。麥卡錫在參議院的影響力自此不再，直到1957年抑鬱而終，只留下一個代表不實的政治指控，不問是非只問立場的政治壓迫，與17世紀對所謂「女巫」的追捕與迫害（witch-hunting）相提並論的名詞，和美國近代歷史中不名譽的一頁：「麥卡錫主義」。

3 團體劇場（The Group Theatre, 1931-1941）是美國在30年代的重要劇團之一，以莫斯科藝術劇院為模仿的範例而建立，主要成員包括表演導師 Lee Strasberg（1901-1982）、導演/評論家 Harold Clurman（1901-1980），和當時最重要的劇作家 Clifford Odets（1906-1963），劇團以集體合作的製作風格，清楚堅定的社會改革意識，和寫實的表演著稱。